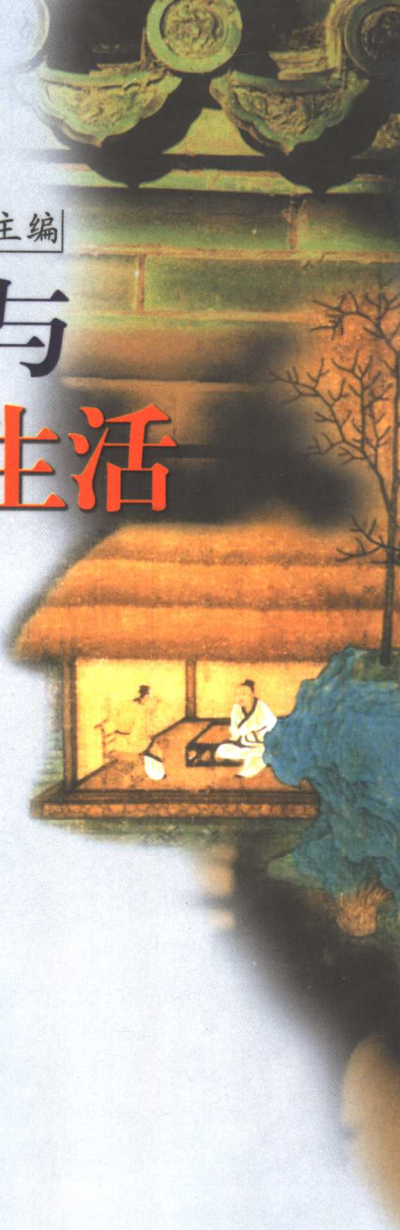


许建平 祁志祥 主编

中国传统文学与 经济生活



河南人民出版社

许建平 祁志祥 主编

中国传统文学与 经济生活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许建平、祁志祥主编.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1
ISBN 7-215-06094-2

I. 中… II. ①许…②祁…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80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57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前 言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将中文学科的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并立足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学科优势与人文学院的哲学学科优势,从全国中文学科发展的大势出发,捕捉并精心设定中文学科特别是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确定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院长张雄教授亲自组织并带领中文学科的带头人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征求专家意见,最终确定将“经济生活与文学”作为主攻方向和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特色。同时商定于2005年10月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讨会。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书即根据会议论文增补而成。

为什么召开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讨会,为什么提出从经济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由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其一,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天然联系。如果说文学是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而情感则是人的欲求在现实中实现状态的生理、心理反映,那么文学不过是人的欲求状态——情感——的艺术表现。而人的欲求的最基本层次是生理的欲求,生理欲求的内容(如食、色、财、货等)的属性是经济的,因此经济生活则是文学自身的因

素而非文学的外在之物。如果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那么,经济生活(包括挣钱、花钱在内的与经济发生关系的生活)是人的生活主体和文学所反映的主体,也自然应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二,文学具有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属性,且同生共存,时主时次,此隐彼现,相互作用,贯穿于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文学创作需要使文学活动可以进行下去的经济条件,一个饿得头眼昏花的人不可能创作,即使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的创作也往往是诞生于田间地头喘息之时,即有闲方有文。至于文人之文,也多有闲者之文,看一看古希腊时代悲喜剧之作、文艺复兴时的文艺经典大多出于富豪之手,而中国古代的典雅文学也大多是不愁吃穿的士大夫所作(这只是说文学创作需要必要的经济条件,并不是说经济条件在创作中起支配作用)。至于创作欲的冲动,似乎是情感——精神的的活动,与财富无关。然而文人的情感则往往是其功名富贵欲望的实现状态的心理反映,其欲望缺失的悲愤、不平以及满足的喜悦都可能形成创作欲的冲动,由此而知创作的欲望既是精神的也是经济的。《诗经》中《氓》篇的女主人公的悲伤情绪便是来自于丈夫因富而易妻的婚变。李煜创作《虞美人》的悲伤情绪,来自于皇帝做阶下囚的政治、经济生活之陡落。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动机,同样来自于其由钟鸣鼎食的繁华生活跌落于贫困中而产生的困苦悲伤情绪。只不过情感、精神处于主导地位,物质生活处于潜在的隐蔽状态罢了。至于某一文学形式所以兴与所以衰,一方面取决于文学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又与文人的兴趣相关。而文人的兴趣,说到底离不开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帝王喜好文学,能者擢官,使得文士趋之若鹜,正是文人功名富贵的欲望拉动了文学创作。如汉赋、宫体诗、唐诗、五代词的兴盛等。戏曲与小说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迎合文学市场的需求。至于市民文学的传播与文学内在形式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虽是精神性的表现,然而支配其变化的因素则是书商与出版商的赢利动机。因为,市民文学传播的必经之路是文本的刊刻,不刊刻则不可能广泛流

传(手抄本极少能传下来),而刊刻则是商业活动,受商业交换规则、规律支配。赢利则须有读者市场,则须满足读者阅读兴趣的需要。正是读者的好奇心理与审美意趣导引,最终支配着书商、出版商直至作者的文学活动。由此可见,在市民文学传播过程中起主导地位的是商品规律与市场规律,是经济性主导精神性。总之,经济属性同精神属性一样贯穿于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既然文学具有精神与经济的双重属性,那么研究文学,就不应单单研究精神性的层面而忽视经济性的层面。

其三,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呼唤经济的理论与视角。任何学术史都是当代史,都是由当代人将当代的文化价值渗透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的结果。同时当代的任何学术研究都须有当代人需求的当前意义。而当代的文化价值与当前意义离不开当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质态。就中国而言,当今的经济结构与质态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文学的研究呼唤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呼唤经济的视角。或者说从经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研究的正大途径。而且,这种研究在此前已有一些零星的成果,显出新趋势、新苗头,这反过来说明,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是时代的要求,且具有可行性。

其四,是从如何有效利用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科优势,凝练中文学科的特点,寻找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考虑的。上海财经大学是一所以培养经济人才为强势学科的名校。近年来,校领导为增加经济人才的人文含量,实现经、管、文、法、理、工的协调发展,重视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在人文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努力下,取得了实效。不仅硕士点覆盖了哲学、史学、文学、新闻学、社会学、语言学、“两课”等学科,而且取得了经济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博士点。在人文学科的发展中,中文学科也在不断积聚实力。目前拥有10位教授(含新引进的2名),9位副教授,2位讲师,其中大部分拥有博士学位。四个硕士点,专业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

文献学、中国应用语言学；在权威及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社会科学》2篇，《文学评论》8篇，《文学遗产》8篇，《文艺研究》4篇，《文艺理论研究》9篇，《学术月刊》8篇，《文史哲》4篇，《北京大学学报》1篇，《复旦学报》8篇，另有《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数十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4项，国家教委社科基金1项，国家古委会项目2项；获得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五个一”工程奖1项，国家图书奖2项，省部级社科奖若干项。中文学科发展到今天，如何挖掘和利用现有师资力量，进行学科凝练，形成自己特色，在学科发展上更上一个台阶，这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苦苦思考的问题。几番调研、几番咨询、几番论证，依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传统优势和人文学院经济哲学的新兴学科支撑点，针对目前全国综合类院校古代文学学科经济生活研究的薄弱现状，我们最终将学科特色凝定为“古代文学与经济生活”，即在经济生活视野下，研究、阐释古代文学。

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曾经是一个老问题，但庸俗社会学、政治决定论盛行的年代，这项研究被曲解和简单化了。新时期以来，摆脱了依附关系的文学研究热衷于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研究，而文学与经济生活的研究则被冷落一旁。这部论集希望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学理平台，从个体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关系切入，重新解读传统文学，弥补这一不足，为古代文学研究寻找新的生长点。但筌路蓝缕，想必还存有诸多不足，恭请各位读者见教。

中文学科的凝练、发展是在校、院两级领导大力支持、精心谋划和组织中进行的。并始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家的指导和支持。所长杨义教授、副所长党圣元教授、《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教授、副主编王保生教授等都曾给予过热心的点拨，甚至参与了审慎的推敲。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于是有了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这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有了这部从经济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论集。

最后,要感谢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撰文;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明先生为本书写序;感谢校外专家奉献弘文;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理论处处长李自强先生热心襄助;并向在我校中文学科发展中所有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仁致以诚挚谢意。

许建平 祁志祥

2006年1月

郭豫适,男,1933年生,广东潮阳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原华东师范大学两届副校长,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两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学科组召集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出版《半砖园文集》、《中国古代小说论集》、《学与思:文学遗产研究问题论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等著作多部。

序 一

郭豫适

2005年10月29日至31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这是全国首次明确地将“经济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学”挂起钩来,并以此作为话语中心和研讨对象的学术会议,到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50多人,我觉得这次研讨会立题新颖,富有学术探讨精神,不仅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乃至对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领域而言都很重要。“文革”以后,我国传统文学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时至今

日,我们应当如何进一步开拓视野?如何寻求新的生长点,探讨新的研究途径?不少同志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也涉及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学术研究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其意义是重大的。这次学术研讨会过后,《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报》等报刊随即作了报道,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现在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由许建平、祁志祥同志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也已编成,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本书围绕“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这一论述中心,从多方面展开了研究。第一个论题是“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的学理依据”,这一组文章很重要,是本书主要精神所在。各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集中阐述了经济和文学的关系,指出二者所存在的关系是内在的必然的而不是附加的。作者们对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的学理依据与学术意义作了很充分的解释,其中颇具理论深度,多有新的见解,对大家很有帮助。第二个论题和第三个论题,分别从“经济生活与文学流变”、“书刊营销与文学传播”两个方面论析了经济生活与古代文学创作及其传播的关系,文章有理有据,读之颇有启发。第四个论题是“作家经济状况与文学创作”,主要是论述前人的经济观念及经济状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其中有一篇文章对20世纪中国作家不同时期所得的稿酬收入情况作过详细的调查,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作家们的经济状况,读来很有意思。第五个论题是“园林经济与园林文学”,几篇文章谈的是园林经济、园林别业、园林宴游与园林文学,这是很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话题,读者从中可以领略古代士人生活及其审美情趣。

本书不是有关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专著,而是有关这一论题的多人论文集。总的说来,基本主题鲜明突出,内容相当丰富,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能够聚集这样一批成果已属不易,论集中那些反映了作者多年研究和思考成果的文章,更加值得我们重视。作为一个读者,我个人从此书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同时也想趁这

个机会,谈一点有关的情况和看法,跟大家讨论。

随着世界上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也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社会思想所出现的种种发展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全面地提升我们的国力、推进社会的进步,哲学社会科学就不应该被轻视,中央多次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要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正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进一步克服学术思想研究途径的狭隘化,不断摆脱一些习惯性思维的影响和束缚。例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我们过去往往只重视它的政治意义,重视它与政治的关系,在这方面用力较多,有时候为了突出政治还对之作出过度的阐释;而对于文学与经济,对于经济生活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则认识不足,很少关注,要谈也只是将经济作为一种背景来谈,即便将两者联系起来评析,也流于一般化,缺乏深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就研究主体而言,是我们学术思想不够开放、活跃,未能确认文学有它的政治属性,同时也有它的经济属性。换句话说,“突出政治”的思维习惯,使人们只重视政治生活与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而不重视经济生活与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以至于阻碍人们对文学属性的全面性认识,未能充分地认识到有关“经济生活与传统文学”的研究意义和价值。由此也使我觉得,这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这本论集的出版,对于全国更多的人一起来开拓、深化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然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不平衡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包括学术领域在内,一种新颖的价值观念的提出和展开,并不是偶然的,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也需要吸纳以往逐渐积累的一些认识成果。回顾一下过去,我国学术界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考过“商”与“文”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和90年代初,有些同志就已经关注到古代文学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的传播与出版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经营的关系,觉察到文学

作品既是文化产品也是一种商品,有些同志已开始认真地就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商人与士人、商贾与世风这类课题进行研究,并且陆续出版了一些值得称赞的著作。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不久前出版的一部专著,即邵毅平同志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这部40多万字的书将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并以时代为序,分章对我国唐以前的文学、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中有关商人的表现,作了系统性的叙述和评论,这是至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商人的一部力作。此书虽然迟至2005年6月方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它的前身是作者1990年起在章培恒先生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当然现在这部著作是经过十年以上时间不断增补方才完成的。在这以前,他的17万字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则已经作为顾晓鸣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商人丛书》之一种,先由海天出版社于1993年11月出版了。

如果说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是取纵向的“全史”式的梳理,而以明清两代作为重点来展开他的论述的话,那么陈大康的《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版)则是采取设置专题的方式从各个角度专论有明一代的社会状况,书中所列15个专题,其中有:《商贾势力膨胀前的艰难挣扎》、《商贾婚姻难题及其家庭生活》、《商贾的发家与经商法则》、《商贾对政治权力的向往与追求》、《儒、商关系之演变》、《突破封建等级制的住与行》、《伪劣商品的制造与泛滥》、《欲海横流与骗局的盛行》等等,全书24万多字,对明代商贾与明代经济生活和社会风貌作了具体的描述和评议。如今收在《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里的单篇文章,不可能有专著那样大的篇幅,而涉及的范围却更宽广,课题也更多样。重要的是,无论是此前的科研成果还是现在的研究著述,共同的学术实践都证明了文学与经济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密切的关系,这再次说明这次学术会议明确地提出文学研究的经济视角,这个理念既是当今文学理论自觉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凝结

了大家在学术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共识。

从经济视角研究文学、研究传统文学,既是对学术研究领域的积极开拓,同时又很有益于读者,使他们的思想精神境界有可能得到滋养和提高。我们知道,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活动,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和条件。人离不开经济生活,经济生活乃是人的生活,而文学则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就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举例来说,如果研究明代商贾与世风这个论题,人们就会认识到:“明代商贾及其活动和势力既与当时历史条件分不开,是明代政治、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综合产物;而商贾们的经济活动、生产方式、道德观念,连同他们逐渐发展起来的势力,又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明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拙文《明代商贾与世风·序》)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不同,它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形象性和生动性使它具有审美的功能,使人易于受到熏陶和感染,再加上研究者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人们从商贾及其活动引发的社会发展变化中,去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状况,去审视生活中的美和丑,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包括去思考如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时同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人们应当具有怎样的财富观,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性会发生变化,思维的水平 and 能力也会得到提高。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作家、评论家和读者所处的地位和视角虽有不同,但创作、研究、欣赏有共同之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面对生活、面对人生,共同处在精神生活之途中,都在不断寻求如何更好地去认识历史和社会,更好地去审视人生和人性的意义,而人类的历史证明,有追求就会有进步,我想这也正是文学研究,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文学研究具有其特殊作用和价值的地方。

最后想提一下学术研究中思想方法的问题。现在我们主张拓宽学术视野,继续解放思想、摆脱传统习惯思维,就很需要遵循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法则。正如本书前言所言:“文学与经济的关

系曾经是一个老问题,但庸俗社会学、政治决定论盛行的年代,这项研究被曲解和简单化了。新时期以来,摆脱了依附关系的文学研究热衷于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研究,而文学与经济生活的研究则被冷落一旁。”现在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为古代文学研究寻找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批评过去学术研究中“突出政治”,批评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轻视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弊病,这种批评无疑是实事求是的;但当我们纠正这些错误和偏颇时,我们同样要实事求是地确认,文学具有经济性和政治性,并不是片面地一概否定对文学作品作政治分析,何况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和政治是并存和互通的;更不是以是否进行了经济生活研究来作为衡量传统文学研究价值的标准,一味追求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经济主义。同样,寻求新的研究途径和新的研究方法,也不是片面地否认过去一切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正如王国维所言,学问没有中西古今之分,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如此。我们应当避免克服了一种简单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简单化。

在文学研究中鲜明地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的研究,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术理念,随着大家的努力,我国传统文学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新的成就。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和论文集的辑集,我是很支持的。至于我自己所见所述,其实很浮浅,主编邀请作序,愧不敢当,但却之不恭,此文权当一篇读后感,作为参加讨论的一次发言,请大家批评指正。

2006年3月下旬

胡明,男,1947年生,安徽绩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胡适传论》等著作多部。

序 二

胡 明

2005年10月,一次全国性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终于在上海举办了。为新世纪的文学研究确定下这一个题目和方向,为这个题目和方向开辟一方学术新天地,我们准备了近一年。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同行们讨论新时代的文学学术生机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题目,想到了沟通“文学”与“经济”两个板块。我们的野心不能太大,“文学”的边界暂且限定在“传统”里,当我将“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连缀成一个会标时,登时觉得打开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一大法门,也为我们新思维的安身立命找到了一个可以纵情驰骋的广阔空间。

闯入这方陌生的新天地,我们思想准备不足,心理准备不足,

材料准备不足,理论准备更不足。我们只能小心翼翼从四条敢于迈步的途径入门,一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二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三是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四是文学史人物的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从这四条途径入门后,我们才可以在这新天地里自由地看天拿云,细心地掇拾香草。这个天地为我们的学术驰骋预设了巨大的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也为我们的理念闯荡与理论挂靠开拓了宽松自由的伦理空间——让我们先在这里跌打滚爬几年吧!

文学史的政治经济学观察、文学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研究、传统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不合理分配关系与剥削体制、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文学史进程的决定意义,尤其是其对文学研究方向的指导意义,我们耳熟能详。那些看似陌生的学理途径与这些看似熟悉的基本教义,在我们的传统文学研究史上其实没有得到过合理的配置,又像是两块落差巨大的断桥桥板,从来没有平实地连通过,对于两个断面的内涵学术界也从来没有拿出过令人信服的科学阐释。我们过去的“经济”阐释层面的主题词是:剥削、压迫、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反动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封建制度必然灭亡、人民创造历史,背后的主脉是经济决定论的一元史观。表面上是经济关系分析,骨子里仍是政治教条挂帅,政治是文学史的核心,政治又是研究史贯穿的灵魂。经济——经济形态与经济生活——只是云里雾里一堆抽象的概念,甚至只是一个道德谴责的符号。——这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可以加上70年代)政治经济学为主干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撰述的主调,几乎所有的大型文学史教材、文学史研究成果、文学作品选本、文学鉴赏读物都深深烙上那一层“经济形态”、“经济生活”的印痕(连钱钟书先生著名的《宋诗选注》选到“农村”时都不能侥幸于例外)。尤其是我们讨论《水浒传》成书时代背景,讨论《红楼梦》“反封建”思想主旨时,所谓封建时代“末世说”、资本主义“萌芽说”都注重于“文学”

与“经济形态”、“经济生活”的血肉联系。至于70年代前期的评红热,已经几乎将学术目光全部集中在“四大家族护官符”、大观园高墙深院内的阶级斗争、乌进孝交租单、丫环侍婢卖身契、人命账、血泪恨,为政治接驾“银子化得像淌海水一样”,甚至连薛蟠在平安州地面遭遇一伙强盗,也诠释为封建时代末世农民起义烽火遍地了。而1973年10月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80年代新时期以来在摆脱了这个政治阐释核心与文学史叙述旧模式的同时,也决然告别了其附属的经济形态与经济生活的主题,抽出了经济形态与经济生活之后,填充进去的是诸如“审美”、“语言”、“意境”、“结构”等“向内转”的表述内容,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于“经济生活”、“经济形态”的字眼感到陌生了,感到心理准备不足了。今天为响应新的历史要求文学研究要凿开这条“灵渠”,主要问题是心理上要迎接这个学术新挑战,要大胆地进入这片新领地。

事实上从这次会议递交的论文来看,已经有一批论旨上相当纯粹、述证上相当成熟的佼佼者。随手可以拣拾两个例子:比如《宋代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朱迎平),讨论的即是出版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据作者简述,宋代雕版刻书蓬勃发展,遍布各地,形成浙、闽、蜀三个中心。产业技术先进,刻工队伍庞大,从刻书到销售,从版权意识到工商管理,文化与经济完美结合,形成一项相对独立的发达产业。这项产业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人文集刊印普遍,文人自刻、弟子刻、亲友刻、乡邑刻、书坊刻、官府刻,途径多样,而且家刻、坊刻多于官刻。二是历代文化经典大量刊布,除经史子部典籍外,《文选》、《文苑英华》等前代文学总集和唐人诗文别集也都大量刊印并广泛流传。三是文学文体演变与选择深受时代影响,如词集在南宋的大量刻印促进了词的大发展。同时各类书籍的刊刻又使“序跋”空前繁荣,这当然又间接推进了文论、诗论、词论的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审美观念的演进与流行作出贡献。四是文学流派借刻书而形